

1898—1949 中英文学关系史述评

中国矿业大学 吴格非

摘要:近现代百年中英文学关系史突出地呈现为三种形式:英国学者和作家对中国文学的主动探询;中国作家在英国开展文学创作与交流活动;以新文化运动为契机,英国文学在中国被有选择地大量译介。百年中英文学的互动体现出双向交流、彼此相长的特征,是架设在两国人民之间的理解之桥、友谊之桥、鼓励之桥和关怀之桥,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文学的思想启蒙、人文关怀作用也因此双方在交流中得到了最大化的实现。

关键词: 中英文学;百年;关系史

作者简介: 博士,教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比较文学和外语教育研究。电子邮箱:wugefei@cumt.edu.cn

中英鸦片战争拉开了中国近代史序幕,也开启了中英文学交流之门。虽然从19世纪初以来,西方传教士便开始进入中国,在传教之余开展一些外国文化传播工作,同时把中国见闻带到海外去,但总体上,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外国传教士即使进入中国也无法正常开展文化交流活动。鸦片战争后这种情况发生了根本改观,以传教士为媒介的中外文化交流活动普遍起来。传教士把中国文学输入英国,带动了英国汉学研究的兴起,也激发了一些英国作家对中国文学的关注。他们有的来到中国,开展文学交流活动,在深入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和民间生活之后,纷纷表达对中华文明的崇拜和赞美。与此同时,中国文学界通过英国传教士对中国的文化输入活动以及一些近代中国翻译家创作的英国文学译文,逐步对英国文学产生兴趣并期望能够详细了解。“五四”之后直至20世纪30与40年代,一批钟情于英国文学的中国现代作家、学者赴英留学、生活、工作,他们有的在英国从事英文创作,把中国人民的生活和斗争情况以文学形式介绍给英国读者,赢得英国人民对中国的理解、同情和支持;有的回国

之后致力于英国文学的翻译和研究,扩大了英国文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对丰富中国现代文学内涵,促进其发展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纵横观测,近现代百年中英文学关系史突出地呈现为三种形式特点:1)英国学者和作家对中国文学的主动探询;2)中国作家在英国开展文学创作与交流活动;3)以新文化运动为契机,英国文学在中国被有选择地大量译介。

1 英国学者和作家对中国文学的主动探询

笔者之所以提出近代中英文学之间的交流与交往关系肇始于1848年,是因为是年传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从故乡苏格兰重返香港,决心从事中国古代经典的翻译和研究工作。此前他已深刻认识到,中国这样一个文明古国的人民,其风俗习惯、行为举止的形成,都能够追溯到远古时代的典籍经书,因此,“要了解中国必须首先了解中国的文学”。(Legge, 1965: 29)此后数十年,在中国学者王韬的协助下,他陆续完成了中国十三经的翻译工作,赢得了世界声誉。由于中国古代的史学和经学著作本身就有很高的文学造诣,因此一直也被视为中国文学经典。所以,理雅各在中国经书典籍方面的翻译活动顺理成章地归为中国文学在英国翻译传播的重要活动之一。理雅各回国后被聘为牛津大学第一位首席中文教授。在牛津大学教授期间,他陆续发表了《中国文学中的传奇与小说》(*Romances and Novels in the Literature of China, 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1893*)、《离骚及其作者》(*The Lisao and its Author*, 同上, 1895)等有关中国文学的研究性论文。理雅各在做这些工作时,可谓呕心沥血、耗资巨大,乃至身心俱损、疲惫不堪。但他锲而不舍,终于成为世界汉学史和中英文学关系史上一座难以逾越的丰碑。成为大师的理雅各还耗费许多业余时间和精力回复英国汉学爱好者们写来的大量讨论和提问的信件。他每问必答,而且回答问题客观具体,耐心至极,每一封回信几乎都是长篇大论。还有一些年轻的汉学爱好者把他们用中文创作的文学作品呈给理雅各,请他提出建议,他都一一批改后作出回复。他说:“我从来没有拒绝过任何向我请教的人。”(同上, 1965: 67)这些虽是默默无闻的工作,但如微风细雨,润物无声,对英国汉学发展起着潜移默化的推动作用。

理雅各的生平活动,开始于向东方宣扬基督教义,终结于向西方传播中国文学与文化。他所走的是一条追本溯源之路,这条道路向西方昭示了这样一个真理,即无论西方出于何种目的对中国发生兴趣,他们要想真正客观地认识中

国,就必须从源头上去了解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精髓,否则西方对中国所做的一切努力终将是徒劳,因为谁也无法从根基上撼动中华文明这棵根深蒂固、枝繁叶茂的大树。对于源远流长、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世界所能做的也许就是对其怀有崇敬并协助将其发扬光大。理雅各对中华文明的由衷敬仰,促使其译文成为典范之作,至今虽逾百年,他的译本仍被认为是中国经典的标准译本。他结束了西方学者对中国文献业余水平的研究,走上了专业化的道路。以他的成就,他被称为近代中英文化交流史上首屈一指的里程碑式的人物,无疑是恰如其分的。

汉学之光不仅耀眼于牛津,在剑桥也熠熠生辉。继理雅各之后,19世纪末至20世纪前期的英国汉学领域迎来了赫伯特·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他曾于1867年至1891年间在英国驻华领事馆任职。在中国期间他潜心于汉语语言文学的研究与翻译,著译成果达六十余种。1897年,他受聘于剑桥大学,继托玛斯·威妥玛爵士后担任该校第二任中文教授直至1928年。1900年前,翟理斯主要翻译中国诗歌,他的译文采用传统英文格律诗的形式,韵律工整,句法严谨,符合那个时代英国读者的审美趣味,从而“极大地激发了英国人对中国诗歌的兴趣”(Giles, 1923)。他译《三字经》,译文依然采用英文格律诗形式。他还译出了《聊斋志异》《老子》《庄子》,编译了《中国文学粹珍》。1897年,也即翟理斯担任剑桥中文教授的当年,他出版了世界上第一部英文版的《中国文学史》。1900年后,他着力于理论研究,陆续发表了《19世纪的儒学》《中国神话故事》《中国古代宗教》《中国绘画艺术导论》和《中国文学题材论文集》等论著,他还为《大英百科全书》撰写了“中国的艺术、语言、文学和宗教”和“中国文明”的条目,这些作品不仅一次次点燃了英国读者对中国古代艺术和儒家思想的探究热情,也为英国汉学研究的理论拓展开辟了道路。

翟理斯发自内心地热爱中国文学。他每出版一种中国文学译文作品,都要在前言中对中国文学大加赞美,而且他一再强调,任何一个真正地阅读和研究中国文学的人都会发现中国人的心灵是很容易理解的,都会沉醉于中国伟大作家崇高热烈的思想感情中。翟理斯在翻译中国文学过程中形成了明确的翻译思想。譬如关于中国诗歌的翻译,他认为充分再现诗歌的内在含义是关键。首先一定要尽可能完美地表现原诗的意蕴,在此基础上,他主张使用韵诗的形式来翻译:“翻译中国诗歌,在尽可能保持含义的同时,我们总是面临两种选择,是用韵体诗还是用不压韵的散文体再现原文。就我个人来说,我选择第一种。”(同上, 1923)翟理斯坚持不受中国诗歌字数多少、句子长短、句子数量和词语排列方式

的限制,致力于用优美的压韵诗形式表达中文原诗的含义和意境。在他看来,所有中国诗都是抒情诗,讲究韵律,而且其中大部分适合谱曲吟唱。英国本土的抒情诗歌也讲究压韵,所以翻译中国抒情诗时可以借用英国的抒情诗形式。可见,翟理斯的翻译不仅是把汉语转换成英语,同时还把中国抒情诗的形式转换成英国的抒情诗,通过翻译实现了中西文学形式上的沟通交流。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20世纪20至30年代,英国再次迎来文学史上的一个伟大时代。这是乔伊斯、艾略特、庞德、劳伦斯、温德汉·刘易斯和立顿·斯恰奇的时代,也是布卢伯里学派的时期,同样还是阿诺德·拜内特和萨默赛·毛姆的时代。战争的残酷使西方世界对自己的文明产生了失望和失落的情绪。英国的文学界正是在这种情绪中悄然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作家和读者关注异域情调,于是他们从古典的西方文明转向古代的东方文化。在这种文化氛围中,毕业于剑桥大学、熟悉英国文学界顶尖作家的著名诗人魏礼(Arthur Waley),逐渐成为跨越东西方文明的文学人物。他自学汉语,达到精通的程度,目的是为了创作出让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普通读者也能够喜欢和接受的汉诗译文。他所选择的翻译诗歌大多内容具体,语言简明优美,意思明白易懂,英国人不需要注释就可以理解领悟。

魏礼一生没有去过中国,而且刻意拒绝去,因为他害怕心目中凭借诗歌建立起来的古老中国的印象遭到破坏。他的作品充满神奇和神秘的东方情调,而这种异国情调能够让爱好文学的英国人理解并产生兴趣,其作品因此获得了文学与社会的双重价值。从1916年到1964年期间,魏礼出版了大约四十部译著,发表了一百三十多篇相关文章,包括翻译的中国、日本文学作品和他创作的散文和诗歌等。其中许多译本被多次出版印刷,发行数量庞大,有的流传广泛、经久不衰,譬如《中国诗歌集》《中国诗歌170首》《中国诗歌译文集增编》《诗经》以及与罗伯特·翟里斯合作翻译的《英译中国诗歌选》等,还有《古代中国的三种思维方式》《儒家思想和中庸美德》《孟子详解》和《论陶潜的诗》等一批理论性研究著作。魏礼在汉学研究中逐渐形成独特的中西文学观和中国诗歌翻译思想,他擅长从中西文化差异的角度对汉诗进行评价,虽带有浓厚的西方主义色彩,但这些异域视角下的观点值得我们思考。譬如中国诗歌讲究用典,倚重模仿套用前朝诗歌名句,魏礼对此不解、反感甚至批判。魏礼对中国诗歌创作所提出的质疑,是异质文化间的审美差异问题,值得中外诗歌研究者进行深入的研究。

关于魏礼的成就,其意义不是简单地把中国诗歌展示给读者,也不仅是打开了一个思想世界,而是带来了当时英国思想界的互动与交锋,具有更深刻的含

义。正如他在谈到翻译《孟子》时所说的那样：“孟子的魅力是道德情感。除非我们认识到这部著作写于道德危机的时代，否则我们将无法真正理解它的思想内涵。迄今《孟子》尚未引起现代世界的足够兴趣，因为它是自我研究的著作，和其他具有挑战性的思想没有关联。”(Morris, 1970: 178) 这就是魏礼超越对中国古典文学传统认识的方面，他对早期不同中国思想之间的关系研究提出了新的理解。1942年，魏礼翻译的《西游记》出版，英文标题是Monkey（“猴”）。这部在二战期间完成的译著反响很大，并且产生了不同寻常的时代效果。当时处于世界大战中的英国人正惶恐地度过每一天，他们想从灾难中解脱却无能为力。《西游记》一出版，立刻被英国读者当作摆脱现实苦难、追求乌托邦理想的神奇小说。当时著名的文学评论家伊迪丝·西维尔(Edith Sitwell)说：“魏礼，我越发感到你的艺术如此神奇。我不知道除了《西游记》外还有哪部作品更能消除现实恐惧和瓦解人们的物质担忧……它让我感到必然性的存在，让我激动之余感到平静。人们读完它后便能平静地面对现实生活。”(Robinson, 1982: 153)

剑桥大学研究员高斯华绥·狄更生(Goldsworthy Lowes Dickinson)是值得一提的汉学家，一是因为他在1907年的时候把中国带进了魏礼的视野，在1920年时把徐志摩介绍到剑桥大学研究文学；再就是他对中国文明颇有研究。狄更生天生喜欢中国，自认为前世一定是中国人，并对中国文明寄予一种乌托邦式的想象。他曾到中国游历，强化了原有的对中国的美好印象。他撰有《一个中国人的来信》和《论印度、中国和日本的文明》，书中他高度赞美儒家思想以人为本的观念，提出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中国诗歌和艺术具有较为完美的人性化精神内涵，这值得罗马人和英国人学习，后者缺乏这种美学天赋；他甚至认为，中国诗是他所知道的最人性化的诗歌，丝毫不带有西方浪漫主义和象征主义的神秘性和抽象性痕迹。狄更生关于中国诗歌和艺术的人本主义观念，对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具有一定的反思意义：是滥用西方理论，还是站在不以西方古典主义和现代主义艺术作为参照的角度审视我们的文学创作传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20世纪20年代到过中国的英国学者还有哲学家罗素。他曾在北京大学讲学数月，在北大师生中引起“罗素热”，其哲学思想受到热捧。但罗素其实是一名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西方哲学家，他崇尚老子的哲学思想，同时“五四”时期的“少年中国”思想也给了他很大的启发，从而能够在现代社会背景下在中西两种文化之间对中西文明的发展前途进行深入思考。罗素于20世纪20年代出版《中国问题》一书，表面看来，他思考的是中国问题，然而他真正关心的是西方人自己的命运。他希望中国传统文明成为欧洲人民心目中的一座道德

丰碑,欧洲的文明能够在此丰碑的影响下继续它的文明发展道路。如他所说:“当我在中国时,我是在教书,但是我每天所想最多的是如何向中国人学习,而不是如何教他们。我发现这种态度在那些久居中国的欧洲人当中并非罕见……我希望中国学习我们的科技知识,而她则回馈我们她的博大宽容和深邃宁静的思想。”(Russell, 1922: 198) 罗素以伟大哲学家和现代西方文明批判者身份求助古老的中华文明,这足以说明中国文化的崇高与不朽,但中国文化以何种方式走向世界,如何才能真正为世界发展和人类前途做出贡献,却是罗素留给我们的一个问题。

20世纪30年代有两位英国人与中国文学发生过密切关系——汉学家E. R. 休斯(Hughes)和诗人朱利安·贝尔(Julian Bell)。休斯于1911年作为传教士来到中国,在此生活了23年,回国后成为牛津大学中国宗教与哲学教授。同许多到中国的西方传教士一样,他认为了解中国,不能不学习中国的文学艺术;要了解现代中国的社会发展和思想变迁,不能忽视中国现代文学的存在状况。为此他专门著书介绍中国新文学运动与西方文学的关系。在1937年出版的《西方世界对中国的入侵》一书中,休斯着力澄清西方对中国文学的误解,认为长期以来,由于翻译到西方的中国书籍以古典文学经典为主,这使得西方学术界普遍以为中国文学只意味着有限的几本古典经书。休斯指出,中国文学之卷帙浩繁,之优美精深,远远超出西方人的想象力:

人们时常这样认为,中国文学仅仅指那些古代经书,以及对那些经书不够完整的阐释。不消说,这种看法多么荒唐……真实的情况是,中国的文人雅士喜好玩赏文学,一如他们喜欢从事文学创作一样。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在宴饮中,在书画中,在与朋友共同欣赏自然美景和闲情逸致的交游中,在隐退高官所创作的幽雅的田园抒情诗中,大量内容精美、风格特异的文学作品被创作出来。(Hughes, 1937: 229—230)

他介绍了鲁迅、周作人、郭沫若、郁达夫、徐志摩、冰心、巴金、茅盾、田汉等十几位中国现代文学界的杰出作家。休斯把“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学运动称为“文艺复兴运动”。他认为,新文学运动不完全是西方思想影响下开展的文学革命,他特别提到了蔡元培、胡适和陈独秀对新文学运动的贡献,并对他们作为文学改革者所具备的“道德勇气”表示敬佩。他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蕴藏的巨大潜力,足以推动现代中国文学的发展进步。他指出,西方知识并不是解决中国

文学问题的良药，“中国从西方获得最初的启发，西方给他们提供词语以及最为关键的进化论理念。但同时文学必须清醒地看到，他们的驱动力来自中国的内在传统以及中国自身的实际需要。”（同上，1937：241）作为一名外国传教士，休斯没有用殖民主义或西方文明中心主义的眼光看待中国问题，他更像一个具有中国民族主义思想的文化学者。他让西方看到了中国现代文学灿烂辉煌的面貌及其发展壮大的自身潜能。休斯使我们看到，西方文化只是对中国文学发展起着一定的借鉴作用，中国文学发展的真正强大驱动力来自中国自己的传统文化内部，中国文学的现代化离不开传统文化这个坚实的基础。

诗人朱利安·贝尔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在武汉大学担任英国文学教授。他讲授英文写作和莎士比亚，开设英国现代派文学讲座。他的学生中，有著名翻译家、作家叶君健。当时的文学院院长陈源的夫人、诗人凌淑华喜欢英国文学，经常到贝尔的课堂上听莎士比亚和现代文学讲座。而贝尔则把凌淑华短篇小说的英文翻译寄给他的英国朋友。贝尔还把凌淑华介绍给了弗吉尼亚·伍尔芙。伍尔芙一直对东方——尤其中国——充满奇异的艺术想象。之后，她们之间进行了长时间的文学通讯。凌淑华定期把自己的作品按章节寄给伍尔芙，她觉得中国和英国的普通人民有着共同情感，通过作品，他们能够彼此了解和沟通，相互鼓励，共同战胜战争恐惧。凌淑华移居英国后，在伍尔芙的鼓励下，曾写了一部英文小说《古韵》（*Ancient Melodies*）。小说通过一个不谙世事的小女孩的眼睛展现了清末中国旧式大家庭的日常生活和人情是非。1953年，《古韵》由伍尔芙夫妇创办的霍加斯出版社出版并成为英语世界的畅销书，好评如潮。

20世纪30年代萧伯纳访问上海是中英文学关系史上一桩颇有影响的事情。1933年2月，萧伯纳来华游历，他先到香港，然后于2月17日抵达上海。在上海不到一天的短暂停留中，他与当时上海政治、文艺和新闻界的一些头面人物——包括鲁迅、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林语堂、梅兰芳、邵洵美等——进行会晤交流。萧伯纳此次来上海时间虽不长，影响却很大，当时各种媒体针对他的文学态度和政治立场发表大量或褒扬或反对或嘲讽的社论。瞿秋白和鲁迅先生对萧伯纳访问上海给以极大关注，尤其非常关心当时新闻界对萧伯纳的种种评论并发表了自己的意见看法，对一些报纸不负责任的攻击谩骂进行了有力回击，表现出对萧伯纳的大力支持。鲁迅对萧伯纳的记述，见于其1933年的散文《谁的矛盾》《看肖和“看肖的人们”记》《〈肖伯纳在上海〉序》《“论语一年”——借此又谈肖伯纳》和《颂萧》中。萧伯纳上海之行虽然时间短暂，但其大文豪的身份和敏感的政治态度却产生了飓风式效果，大量五花八门的关于萧伯纳的评论集中“爆

发”，当时中国诸多复杂的社会政治矛盾在各类文人对萧伯纳的态度中凸显出来。这是一般情况下文学研究很难达到的效果。

2 中国作家在英国开展文学创作与交流活动

20世纪20至40年代，远赴英国工作、留学、生活并从事中英文学交流活动的中国作家不在少数，其中有徐志摩、许地山、老舍、朱光潜、朱自清、钱钟书、杨绛、萧乾和叶君健等知名人士。

许地山在牛津大学潜心读书，钻研儒释道和基督教，颇有心得，毕业后在国际上传播道教和佛教，其成就曾得到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的赞扬。朱光潜于1926年到英国爱丁堡大学求学，研究英国和欧洲的文艺美学，完成硕士学业后赴法国留学。他的著名博士论文《悲剧心理学》虽然是在法国留学时出版，但是在英国期间的研究工作基础上完成的。朱先生在1933年由斯特拉斯堡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悲剧心理学》前言中写道：“我也愿借此机会感谢我从前的英国老师，曾给我许多鼓励和帮助的格里尔生教授和屈列维教授。”他把书赠给了母校爱丁堡大学。这本书至今保存在爱丁堡大学图书馆。

徐志摩于1920年9月从美国来到伦敦，后去剑桥。剑桥是一座山灵水秀的大学城，荟萃了人文和自然灵光，成为徐志摩一生文学创作和思想变化的重要转折点。徐志摩在剑桥爱上文学并开始写诗，写出了《再别康桥》这样家喻户晓的诗篇，以及气势恢弘、情感真挚、思想深邃、语言优美、饱含艺术灵感与人生智慧的长诗《康桥，再会吧！》。在留学剑桥期间，他交友广泛，结识了不少英国作家和学者，其中有威尔斯、哈代、曼斯菲尔德等著名作家。尤其是1922年7月在伦敦，徐志摩会见了旅英新西兰女作家曼斯菲尔德，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象。1925年7月在埃塞克斯，他登门拜访了哈代，一起谈中国的诗，谈哈代自己的诗，谈曼斯菲尔德、狄更生、诗人勃朗登和麦雷等，这次会谈对徐志摩文艺观的改变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效果。

除了与现实中的作家交往，在剑桥读书的徐志摩还常常沉溺于对故去诗人的神游冥想中。他崇拜浪漫主义诗人拜伦到了着迷的程度。1925年4月2日，他完成了歌颂拜伦的散文《拜伦》，这是一篇感情澎湃、言辞激昂的文章，颇得拜伦诗歌《唐·璜》的气势。他把自己的全部激情沉浸在拜伦诗歌的意境之中。徐志摩对莎士比亚悲剧艺术的解读很有其独到之处，希望借莎士比亚之手，改善中国文学中缺乏真正悲剧艺术和悲剧审美的状况。他认为中国文学“承古圣贤

的恩典,把生命的大海用礼教的大幔子障住了”(徐志摩,1994:115),因此,“我们从没有出过悲剧的大诗人,从没有人曾经深入灵府里最密奥最可怕亦最伟大的境界里去探险,向来用文艺的方法记载他稀有的经验。”(同上,1994:116—117)徐志摩推崇乔伊斯,被其新鲜的创作手法所激励吸引之后乘兴而发。他讲到自己写的《康桥西野暮色》一诗时说,“那时我正在看James Joyce哄动一时的*Ulysses*(《尤利西斯》),所以乘兴写了下来。”(袁可嘉,1992:21)徐志摩着迷于雪莱,赞美他诗一般的人生结局。他说:“我希望我将来能得到他那样刹那的解脱,让后人谈起就寄以无限的同情与悲悯!”(凡尼、晓春,1992:5—6)不管是巧合还是命运的安排,徐志摩后来竟然飞机失事。不可得知在飞机坠落的刹那间徐志摩是否想到了雪莱。如果那样,他应该是微笑着随飞机扑向大地。

20世纪20年代,老舍在伦敦大学广泛涉猎英国小说,不断思考着中英民族性的差异,并由此深入文学创作领域,回国后成为一代小说和戏剧大家。在英国教书期间,老舍大量阅读英国文学名著,模仿英国小说的写作笔法和描写风格。他喜欢济慈、罗赛蒂、威廉·莫里斯、沃尔特·佩特、华兹华斯、萧伯纳、王尔德、艾迪逊、菲尔丁、梅瑞狄斯、乔治·艾略特、斯威夫特、切斯特顿、康拉德、劳伦斯、亨利·詹姆斯和笛福等一大批英国作家,尤其受狄更斯的启发最大。从英国文学那里,老舍学会了创作小说,他的文学批评理论也颇受英国文论影响。老舍还喜欢深入英国社会生活,把他所见所闻描写出来。他描写英国社会,既感叹于那些吸引人的地方,也嘲讽一些令人乏味厌倦之处。他还把从英国看到和感受到的东西和在中国的所见所闻进行比较,不知不觉中,老舍产生了书写中英民族性差异的念头。其代表作《二马》应是最早的海外华人创业小说。老舍让读者洞悉海外华人形象的同时,更提出了令人深入思考的问题,那就是,海外华人在既不能抛弃自己的文化传统、又不能简单守旧的两难选择中如何应对?他的讽刺语言尖刻犀利,但切中要害,发人深省,这一手法杂糅了18世纪英国散文和19世纪维多利亚工业小说的风格。但他不是刻意模仿,而是“化”为己用,洋为中用,符合中国读者的审美口味和中国文学的价值取向。

20世纪30年代有朱自清、钱钟书和杨绛等著名作家留学英国。朱自清是1931年8月到的英国,进修语言学和英国文学,后又漫游欧洲五国。1932年7月回国,任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1934年出版《欧游杂记》,1943年出版《伦敦杂记》,这些文笔优美、文思朴素缜密的散文集,展现了英国及欧洲的风土人情和文化面貌,不仅拓展了读者的视野,还使他们获得身临其境般的美妙感受。1935年,25岁的钱钟书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英国庚子赔款公费留学生,妻子杨

绛同船赴英国牛津大学埃克塞特学院英文系留学。1937年钱钟书在牛津大学英文系毕业,获得文学学士学位。1938年从欧洲回来后,钱钟书被清华大学聘为英文教授,次年转赴国立蓝田师范学院任英文系主任。杨绛回国后曾在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外语系、清华大学西语系任教。他们凭借在国内外获得的深厚学养,在我国的外国文学翻译与研究领域以及文学创作领域做出了杰出贡献。

20世纪40年代,有两位著名中国作家在英国从事英文创作,把中国人民的生活直接展示给了英国读者,并在英国创作界开展广泛的交流活动。他们是萧乾和叶君健。萧乾于1939年以汉语教师和外国通讯员的身份赴英国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院任教,后留学剑桥。在那里,他频繁参加各类学术团体的活动和集会。在一次文学集会上,萧乾认识了著名作家爱德华·摩根·福斯特,并与后者结为挚友。他说:“我唯一的真正友谊是在我与福斯特之间”。(Hsiao, 1990: 111) 萧乾在英国期间致力于中国新文艺运动在英国的传播。1940年初,身在剑桥的萧乾应伦敦笔会中心秘书长贺尔门·欧鲁德的邀请,赴伦敦参加了一次午餐会并作了关于中国新文学运动的演讲。他撰写的《苦难时刻的蚀刻》于1942年以英文形式由英国乔治·艾伦与恩温公司出版,全面介绍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和成就。此后,萧乾以英文形式在英国又陆续出版了四本介绍中国的书:《千弦琴》从多个角度对中国文化进行介绍;《中国并非华夏》介绍了中国的历史、地理、社会文化、抗日战争期间中国的政治局势,以及中国的未来图景;《吐丝者》是萧乾自选自译的散文小说集;《龙须与蓝图》讨论了中国知识分子和中国文学对于西方现代文明所应采取的态度,以及中国现代文学面对现代世界的发展之路。萧乾的作品在英国产生了很大反响。以《苦难时刻的蚀刻》为例,该书出版后,他说:“没料到所有伦敦出版的报纸都写了评论。”(萧乾,1992) 1942年3月21日的《泰晤士报·文学增刊》有文章评论说:“从这一次的文章中得知,中国的新文学充满的活力。”在谈到中国已译介了许多欧美作品时,文中呼吁:“我们也应该回报一下,把中国新文学作品介绍到西方来。”(同上,1992) 小说家约翰·韩普森在《旁观者报》上说:“凡关心东西方文化的交往的人都应一读此书。”(同上,1992)

著名作家和翻译家叶君健于1944年10月来到剑桥大学国王学院,他是作为一个欧洲文学的研究者住进这个大学城的。在英国期间,经贝尔介绍,叶君健认识了伦敦《新作品》杂志编辑约翰·莱曼。贝尔还把叶君健的一些英文作品推荐到《新作品》上发表。英国的《读者文摘》杂志曾约他写一篇小说,名叫《冬天狂想曲》,完成后发表在1946年该杂志的圣诞专号上,成为献给英国人民的一

份圣诞礼物。叶君健把这篇小说和他在1944至1945年间发表的8篇小说编成一个短篇小说集,取名《无知的和被遗忘的》,于1946年由英国森林女神出版社出版。该小说在出版当月被英国“书会”选为介绍给读者阅读的“推荐书”之一,结果“它立刻引起了评论界的注意。英国所有的重要报刊纷纷发表有关它的评论,认为它的题材充满了生活气息,写法表现出中国文化独特的艺术趣味,给英文的创作界吹进了一股新风。”(叶君健,1992)叶君健还在英国撰写出版了长篇小说《山村》,其写作动机是澄清英国知识分子对中国正在进行的革命存在的许多误解。该小说于1947年7月出版,当月被英国“书会”评为该月英国出版的最佳作品,销售两万册,远远超过一般严肃作品的至多三千册的印数。

萧乾和叶君健在英国用英文创作所取得的成功以及他们的影响,让我们看到中国现代文学的创作风格、文化内涵和思维方式对英国读者的吸引力,看到了中国人民渴望了解现代中国的迫切心情。当然,英国人的好奇心首先需要我们去开启。英国人在语言上的自负与傲慢常使得他们更希望通过英文去了解其他国家的历史与文化,不过,一旦他们的中国视野被精通英文的中国作家打开,他们也许比欧美其他任何国家的人民都更愿意接触中国文学,甚至向中国文学学习。从这个意义上说,萧乾和叶君健在英国的创作经历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3 以新文化运动为契机,英国文学在中国有选择地被大量译介

中国近现代作家是具有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一个群体,他们对英国文学的翻译呈现出显著的政治意图和社会抱负,这也是他们选择作家、翻译作品的主要依据之一。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使大清帝国的羸弱无能暴露无遗,于是传播西学、师夷长技成为朝野共识。中国一批最早接受西方思想的知识分子为译介西书、传播西方政治体制和科学知识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然而,中日甲午海战中清政府的惨败,再次将中华民族推到危亡关头。此时,严复翻译了《天演论》,并于1897年12月在天津出版的《国闻汇编》刊出。该书问世产生了严复始料未及的巨大社会反响,维新派领袖康有为见此译稿后,发出“眼中未见有此等人”的赞叹,称严复“译《天演论》为中国西学第一者也”。《天演论》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学作品,但对中国近代新文学运动的发生和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自此书出版后,物竞天择、优胜劣败等词,成为当时知识分子的口头禅。鲁迅在南京求学期间已接触到严复的《天演论》译文,他读《天演论》译著时,曾如饥似渴,废寝忘食,以至于“一有闲空,就照例地吃俸饼、花生

米、辣椒,看《天演论》”(鲁迅,1979)。可以说,《天演论》启发了像鲁迅那样一批忧国忧民、为民请命的近现代作家,鼓舞着他们的斗志。

近代大翻译家林纾和严复一样,是个愤世嫉俗的爱国者。他曾用一腔爱国热血挥就了百余篇针砭时弊的文章,用犀利、恰切的文笔完成了《畏庐文集》《讽喻新乐府》《巾幗阳秋》等四十余部书,勾勒出中国近代社会的人生百态。林纾对英国文学甚为偏爱,他主要翻译狄更斯和哈葛德的小说。如果说严复是中国现代文学新观念的思想启蒙人的话,那么林纾堪称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开路先锋。林纾翻译外国小说的目的,一是传播西洋文化,以其革命和道德精神感化国人,“为振作志气,爱国保种之以助”(林纾,1901);二是传播西洋的小说技艺。他的翻译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和贡献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他的翻译文学是以传统的中文文化再现西方文学的内容、思想,以古典的文字与现代意识相结合,客观上对中国文化的建设具有积极的意义,同时起到了拯救汉语文字的历史作用。其二,林纾的翻译文学对中国本土文学的创作观念和创作手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林纾的翻译还开启了中国翻译文学殿堂之门。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前20年这段时期,翻译文学呈现爆发态势,这不能不说是林纾翻译带动的结果,人们从喜爱林纾翻译的语言风格开始去阅读他的小说,又从他的小说当中发现了一个精彩纷呈的西方文学大世界,于是翻译西方文学靡然成风,而由此带来的社会影响是难以估量的。这方面,郭沫若的话颇有代表性,他曾说:“林琴南译的小说,在当时是很流行的,那也是我最嗜好的一种读物。……他在文学上的功劳,就和梁任公在文化批评上的一样,他们都是资本制革命时代的代表人物……林纾小说对于我后来在文学上的倾向有一个决定的影响的。”(郭沫若,1979)钱钟书也曾坦承自己受到林纾翻译的影响:“林纾的翻译所起的‘媒’的作用,已经是文学史上公认的事实。他对若干读者也一定有过歌德所说的‘媒’的影响,引导他们去跟原作发生直接关系。我自己就是读了他的翻译而增加学习外国语文的兴趣的。”(钱钟书,1984:269)

五四运动前后的新文化运动是中国历史上一场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的思想解放运动,它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愚昧;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新文化运动催生了一批洋为中用的文学家兼翻译家,他们以介绍西方思想为先导,倡导新制,反抗旧体,在此过程中,一大批具有革命性和改良性的外国文学作家和作品被介绍到中国。

田汉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剧作家,他的绝大多数剧本都是用悲剧形式反映人民的穷苦生活,揭露封建专制统治,用积极浪漫主义精神抒发中国人民

要求改变黑暗生活状态,追求光明的美好愿望,歌颂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反抗精神。他的作品语言生动,性格鲜明,经常运用丰富多彩的现实主义手法。在对英国文学特别是戏剧进行翻译和研究的时候,田汉总是以此为标准选择其翻译和研究的对象。他还为英国19世纪的浪漫主义正名,认为“Romanticism是Renaissance的特产物,是掀翻欧洲若干年的传统、形式、习惯、拘束的新气力……没有Romantic的文学,也决难脱去Classic的陈腐,进到Realistic的坚实性。”(田汉,2000:92)田汉谈到浪漫主义进步性的用意,在于评价中国文学。他认为中国现代文学正需要引进西方的浪漫主义文学精神,以创造生机勃勃的中国新文学。他说:“文坛的新进作家和批评家都认今日的中国为Renaissance时代呢!!那么‘罗曼主义’在今日的中国,如欣慕新美之心,积极的反抗的感情、自由自在的精神,都是少年中国的少年思想家、文学家、美术家乃至社会运动家等应该采撷的!!”(同上,2000:92—93)田汉还大段大段地引用并且介绍了英国女诗人内斯比特(1858—1924)的劳动诗歌,他的立场依然是关心中国的劳动者现状。田汉认为,内斯比特的诗歌创作于20年前,表现了当时英国劳动者说不尽的苦楚,同时也表现了一种坚定的信仰,就是苦难的黑夜即将过去,“世界上隔‘天亮’的时候逐渐近起来了”(同上,2000:112)。田汉高度评价弥尔顿和华兹华斯,通过他们表达其支持妇女解放、革除社会腐败的思想。在1920年8月《少年中国》第1卷第8期的文章《吃了“智果”以后的话》中,讨论了弥尔顿史诗《失乐园》中夏娃偷吃禁果的过程以及之后的不幸遭遇,作者由此联系女性长期遭受的压制甚至迫害的思想文化根源,认为从古代到现代社会针对女性的法则,譬如中国的所谓“礼”,乃是男性主导的社会压制女性的清规戒律。他喜欢引用华兹华斯《纪念弥尔顿》(*To Milton*)诗中所描述的当时英国腐败与暴政的状况,认为华兹华斯在诗中的呐喊与激情对改革中国社会也有同样作用:“疾风靡物而思劲草,中原板荡而思忠臣,华氏以英国腐败而思蜜尔顿,人之情也。今请得略叙蜜尔顿氏之生平,及其与时代之关系。意者其药石英国之大精神,或亦能药石今日之中国。”(同上,2000:364)

被誉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的鲁迅先生,就是本着“呼喊和反抗”(郑松楦,1987:112)意图翻译外国文学的。鲁迅十分看重浪漫主义时代的英国诗人,他曾于1907年发表《摩罗诗力说》,这是他早期最重要的文艺著作之一,也是新文化运动中的重要一笔。鲁迅在其中论述了八位“摩罗”诗人,旁涉多名其他诗人。他所论及和涉及的英国诗人有彭斯,拜伦,雪莱,卡莱尔、弥尔顿等。拜伦、雪莱是具有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情怀的浪漫主义时代诗人,特别是拜伦长诗

《堂·璜》中的《希腊岛》被认为集中表现了作者浪漫主义思想中的政治自由与社会抗议意图。这首诗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曾被多次翻译。鲁迅认为,“无论是雪莱,拜伦……都是带着社会改造的理想之文明批判家,不单是住在象牙之塔里的”(鲁迅,1982a: 241)。尤其是拜伦的诗歌“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其主题是“鼓吹自由,抨击压制”,“抗天拒俗”,“反抗复仇”(鲁迅,1982b: 81),他们就像反抗上帝的撒旦一样,是精神世界的战士,鲁迅要把以拜伦为代表的激进的欧洲浪漫主义诗人推荐到中国,表达了他欲做中国文学界“摩罗”的坚强决心。鲁迅本来就有一种抨击扫荡、革新传统的思想意识,他大力倡导通过必要的革命来打破思想禁锢,解放国民奴性,塑造独立自由人道之精神,这点与拜伦极为契合,所以拜伦成为鲁迅在思想和文艺上的海外知音。

英国著名诗人拜伦还为众多其他中国现代作家所钟爱,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除鲁迅外,梁启超、苏曼殊、郑振铎、沈雁冰、王统照、赵景琛、徐志摩等人通过多种文学创作形式把拜伦精神带到中国。梁启超译《哀希腊》,苏曼殊译的《赞大海》《哀希腊》《去国行》和《答美人赠束发带诗》,当时堪称独树一帜。梁启超译拜伦诗,一开始的出发点是为了掀起“诗界革命”。他说“顾常好言诗界革命,谓必取泰西文豪之意境、之风格,熔铸之以入我诗,然后可比此道开一新天地,谓取索士比亚、弥尔顿、摆伦诸杰讲,以曲本体裁译之,非难也。”(梁启超,1960: 82)他有感于拜伦献身于自由和独立的伟大精神,对拜伦诗歌的译介进一步上升到了政治层面:“拜伦最爱自由,兼以文学的精神……助希腊独立,竟自从军而死,真可谓文界里头一位大豪杰”(同上,1989: 19)。他推崇拜伦献身独立自由和从军而死的精神,并将融注了拜伦精神的作品积极译介给国人,就是为了推动中国的维新革命,鼓舞国人。苏曼殊译拜伦,一方面因为曼殊认为他与拜伦具有比较相似的信念、性格和经历,另一方面因为他推崇拜伦为其他国家的民族独立运动奋不顾身的精神,“谋人家园,功成不居,虽与日月争光可也”(梁启超,1960: 82)。苏曼殊曾积极参加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斗争,就是受了拜伦精神的鼓舞。在1913年所写的《讨袁宣言》中,他以拜伦为榜样,号召人民起来讨伐袁世凯的倒行逆施:“昔者,希腊独立战争时,英吉利诗人拜伦投身戎行以助之,为诗以励之,复从而吊之曰Greece! Change thy lords, thy state I still the same; Thy glorious day is over, but not thy tears of shame …”(苏曼殊,1985: 125)他曾赋诗一首曰“题《拜伦集》”,诗中表达了他与拜伦的心灵与精神的契合:“秋风海上已黄昏,独向遗篇吊拜伦。词客飘蓬君与我,可能异域为招魂?”

作为英国浪漫主义诗派代表之一的雪莱也曾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产生过重

要影响。鲁迅、郭沫若都曾向中国的读者介绍过这位19世纪英国的杰出诗人及其作品，鲁迅第一个把雪莱作为“摩罗诗人”介绍到了中国，而郭沫若则翻译了很多雪莱的诗。鲁迅十分欣赏雪莱的叛逆人生，曾多次提及雪莱的诗作《伊斯兰的起义》《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和《钦契》等，尤其对于《伊斯兰的起义》中的英雄人物罗昂赞扬有加。郭沫若对中国浪漫主义诗歌运动的推进以及他本人的诗歌成就，与雪莱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郭沫若说：“雪莱是我最敬爱的诗人中之一个。他是自然的宠子，神宗的信者，革命思想的健儿。”（郭沫若，1982：178）郭沫若翻译雪莱，是出于一种对旧的僵化文学表达方式的反叛，而反叛旧的形式，是因为他被雪莱的革命浪漫主义激情所感动，促使他冲破旧观念的樊笼，创造新的自由理想。

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新文学界颇有影响的另一英国作家是王尔德。新文化运动的目标之一是反抗陈腐保守的道德戒律，尤其是束缚人性、遏制平等的封建礼教思想。于是，藐视清规、追求个性解放的王尔德进入新文学作家的视野。英国文学中，王尔德戏剧较早以白话文形式翻译成中文。他在中国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当时的一些著名作家和知名杂志产生的。周作人不仅翻译王尔德，也评价王尔德以及他人所译的王尔德作品，而且他主要从童话和儿童视角出发去发现王尔德独特的艺术世界，因为童话和童心往往代表人类道德的至高至善至纯境界，能够折射出成人世界的恐怖与虚伪；田汉关注王尔德，更多的是崇拜他对人生境界的切入灵魂的体会，在灵魂与肉体的斗争中，肉体遭受悲剧的打击之后，却往往能换来灵魂的纯洁，这就是王尔德给予田汉的启示。郁达夫亲近王尔德，不仅因为他完全赞同后者的唯美主义艺术倾向，还因为他们都有一种离经叛道的共同价值取向，郁达夫是一名坚定的反禁欲主义者，在这一人生态度上，他和王尔德或多或少地属于一类。

4 结语

总起来说，近现代百年中英文学关系呈现出双向交流、彼此相长的特征。值得思考的是，交流的双方，一边是老牌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工业化国家，一边是饱受外国列强欺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经济政治地位的不平等却并未阻止文学上的平等交流。从1848至1949年，中英文学之间交往频繁。从事件发生时代的角度看，19世纪后半叶的文学交往集中体现了英国学者对中国文学的好奇与接受，虽然当时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英国对中国形成了侵略态势，但

在文学和文化领域却呈现出中国向英国的反向渗透趋势，在一定程度上消解英帝国主义的文化殖民企图；20世纪初至20年代则为双向交流的繁盛时期，虽然英国依然保持着对中国文学的强劲关注，但中国作家对英国文学的翻译与研究成为这个时代的显著特征之一，进入中国的英国文学在“五四”前后的思想解放大潮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积极作用；20世纪30至40年代，中国文学再次成为英国读者关注的焦点，处于第二次世界大战阴影下的英国人民从中国文学中找到了慰藉和力量，而萧乾和叶君健等作家在英国的创作不仅激发了英国人民对中国民生、中国抗战和中国革命的理解与同情，而且开启了英国人的中国视野，激发了他们了解、认识中国文学的浓厚兴趣。总之，百年中英文学的互动是架设在两国人民之间的理解之桥、友谊之桥、鼓励之桥和关怀之桥，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文学的思想启蒙、人文关怀作用也因此双方在交流中得到了最大的发挥。

参考文献

- Giles, H. A. 1923. 'Preface'. *Gems of Chinese Literature: Verse*. London: Bernard Duaritch, Ltd.
- Hsiao, C. 1990. *Traveler without Map*, London: Gentry Huchinson Ltd.
- Hughes, E. R. 1937. 'Author's Preface'. *The Invasion of China by the Western World*. London: Adam & Charles Black.
- Legge, H. E. 1965. *James Legge: Missionary and Scholar*. London: The Religious Tract Society.
- Morris, I. (ed). 1970. *Madly Singing in the Mountains*. London: Walker.
- Robinson, A. 1982. *Waley. Half of Two Lives*.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 Russell, B. 1922. *The Problem of China*.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 凡尼、晓春, 1992, 《徐志摩: 人和诗》, 桂林: 漓江出版社。
- 郭沫若, 1982, 《屈原》与《厘雅王》, 《沫若选集(四)》,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 1979, 《少年时代》,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 梁启超, 1960, 新中国未来记, 载阿英(编), 《晚清文学丛钞·小说一卷(上册)》, 北京: 中华书局。
- 1989, 《三十自述》, 《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林纾, 1901, 《〈黑奴吁天录〉跋》, 武林魏氏藏版。

鲁迅,1979,《朝花夕拾》,杭州:浙江文艺。

——1982a,出了象牙之塔·后记,《鲁迅全集:第十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b,坟·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钱钟书,1984,林纾的翻译,《翻译研究论文集,1949—1983》,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苏曼殊,1985,拜伦诗选自序,《苏曼殊全集》第一卷,北京:中国书店。

田汉,2000,《田汉文集》第14卷,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

萧乾,1992,我的副业是沟通土洋,《新文学史料》(1): 19。

徐志摩,1994,《徐志摩全集补编》第3辑,上海:上海书店。

叶君健,1992,在一个古老的大学城,《新文学史料》(3): 11。

袁可嘉,1992,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在中国,《文学评论》(4): 21。

郑松锬,1987,《鲁迅早期的个性主义及其对西方文学的介绍》,《鲁迅与中外文化》,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